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若干问题

颜广林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K263/11

75545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若干问题

颜广林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DM52/25

责任编辑 夏德元

责任校对 陆宏光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若干问题

颜广林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94,000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309-00351-9/K·15

定价:7.00 元

前 言

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本书作者讲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历史的部分专题讲稿。其中，有些专题分别给研究生、大学生和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讲习班的学员讲授过。前几年，有的单位曾将其中的几个专题汇编成册，这次正式出版时，作者对小册子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并增加了几个新的专题。

本书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史论结合，比较详细地阐述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若干问题，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的建设的教学工作者以及史学爱好者提供一定的史料。

本书作者在江西省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单位工作过好几年，曾到不少地方搜集革命史料，并访问过数十位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首长和老同志。在“井冈山斗争始末”和井冈山时期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专题中，作者吸取了许多老首长和老同志以及井冈山、宁冈、永新、遂川各有关单位所提供的大量史料。

本书作者曾协助李维汉同志整理过回忆录。“研究八七会议时的新发现”、“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探索”和“党的六大前后”等文，是作者前几年介绍李维汉同志的“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和研究”、“回顾党的六大前后”等文的讲稿。这些讲稿，叙述了李维汉同志撰写这几篇回忆录的感人事迹并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但因是介绍李维汉同志的文章内容，其中有不少论述与回忆录是

一致的。李维汉同志的这几篇回忆录虽然是由我具体执笔的，但这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刘经宇、叶心瑜同志和我3人协助整理的（我们还协助整理了“回顾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一文，约3.6万字，李维汉同志因病未能过目，后来没有发表）。如果没有李维汉同志提供观点、素材和亲自修改，没有刘经宇、叶心瑜同志的具体组织、指导、帮助和修改，没有廖盖隆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审阅修改，我是不可能完成李维汉同志交给的任务的。如果我未能完成李老交给的任务，当然也就不可能写出介绍李老回忆录的几个专题。

“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主要是对上海市高教局组织编写的上海市统编教材“中国革命史教程”第五章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在这方面，本书作者曾从这本“教程”的主编姜义华教授那里得到过启发和帮助。

在编写过程中，我还参考了不少有关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及党的建设的书籍和文章，吸取了近几年来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高若海、陈士强、夏德元等同志也给了本书作者以很大帮助。

对于我从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得到启发和养料的作者们，对于给我提供过革命史料的老首长、老同志以及井冈山、宁冈、永新、遂川有关单位的同志们，对于在编写过程中对我有过直接或间接帮助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本书作者的理论水平、科研能力和掌握的资料都有限，加上决定出版本书的时间较晚，修改的时间很短促，不妥或错误之处一定难免，热忱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颜 广 林

1989年3月18日

目 录

前 言	1
一、井冈山斗争始末	1
退却与进攻的巧妙结合	1
根据地的初具规模	12
全盛时期的形势	28
八月失败的前前后后	41
恢复和巩固时期的主要斗争	49
出击赣南与坚持斗争	63
错杀袁、王的经过和原因	86
井冈山斗争史的启示	99
二、研究八七会议时的新发现	102
八七会议是在何种情况下召开的?	103
讲八七会议内容要以会议记录为准	115
从八七会议到八九会议	123
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和主要缺点	127
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探索	133
八七会议后所取得的成绩	134
从十一月一日中央常委会议到十一月扩大会议	140
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几个决议案	145

盲动主义“总策略”的执行与徘徊	160
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及其在中国的反响	168
李维汉对错误原因的反思	176
对瞿秋白的评价	183
四、党的六大前后	191
六大的历史背景和准备工作	191
六大的经过	199
留守中央领导的国内斗争	211
围绕中央五十四号通告的一场争论	221
六大精神的传达贯彻情况	229
对六大的评价	234
五、红军党内的思想教育	244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244
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疑问的答复	246
克服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	250
从张果老和“座上客”引起的联想	254
讲“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	258
调动党员参加会议的兴趣	262
做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265
六、湘赣边界党的组织建设	270
组织建设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270
几位同志的入党经过	275
边界各级党的组织状况	279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厉行洗党”	290

培养和造就干部的方法与政策	293
一个模范党支部	302
七、精心培育党的优良作风	306
怎样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306
如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315
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怪物	326
八、古田会议研究	335
挺进赣南闽西后的成就和问题	335
中央九月来信的贯彻	342
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	346
古田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351
驳林彪、“四人帮”的“复古”论	357
九、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若干问题的思考	361
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背叛了革命?	361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经济情况	364
讲土地革命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369
关于文化“围剿”与反“围剿”	370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373
国共两党为什么能由严重对立走向合作抗日?	379
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间派的评价	381

一、井冈山斗争始末

我曾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工作过几年,对井冈山斗争史作过很多次调查,并曾访问过几十位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首长和老同志,后来编写《井冈烽火》一书时,又把井冈山斗争的史料作了系统的整理,现把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向同志们介绍一下。我准备讲以下几个问题。

退却与进攻的巧妙结合

这里主要是想讲讲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的进军。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的进军,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秋收起义。时间是从党的“八七”会议到文家市会师。

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沈家大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选举常委及讨论秋收起义的问题。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并就会议所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这次会议围绕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主要解决了5个问题:

第一,要以主要力量领导武装斗争。毛泽东指出,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军事的帮助,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作骨干,否则起义难免要失败。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军事,现在应当以主要精力注意军事运动,所谓以“主要精力”,是指最少以60%的力量搞武装斗争。

第二,用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秋收起义。会议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已经死了,并且臭了,而且臭闻于天下。因此,对于这次起义,会议坚持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去号召发动,不要用国民党的名义。根据这一原则,会议确定了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一个是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易礼容任书记。

第三,确定了举行秋收起义的地区。湖南省委曾经设想,在湘中以长沙为中心,在湘南以衡阳为中心,在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在西南以宝庆为中心,在全省范围内同时发动秋收起义,这样范围就比较广。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感到范围这么大不行,所以在讨论暴动计划时,毛泽东坚决反对那种不顾主客观条件,在全省同时暴动的意见,主张缩小范围,集中力量于一个中心地区举行起义。经过讨论,多数同志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最后决定: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阳等地的湘赣边界举行秋收起义。

第四,秋收起义的任务是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在暴动力量发展大的地方应立即建立政权。在这里,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

第五,由武装斗争来推动土地革命。毛泽东指出,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因为中国的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没收的办法,要由我们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具体办法由农民协会或革命委员会执行。

沈家大屋会议后,毛泽东从长沙出发,途经株州等地布置工作后,到达了江西安源。他一到安源,立即向当地党的负责

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改组经过和秋收起义计划，宣布了省委关于建立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的决定。随后，毛泽东于9月初在安源召开了军事会议。当时，将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第一团的主要成份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加上湖南平江和湖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驻在江西修水；第二团以安源路矿工人武装为主，也包括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的农民武装，驻在安源；第三团主要是湖南浏阳的工农武装和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另一部，驻在铜鼓。人数共有5000多人。部队统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沙德铭任总指挥。此外，还有收编的第四团邱国轩部，起义一开始就叛变了，这里没有统计在内。与此同时，根据党中央的有关决定，会议决定暴动开始后，第一团由修水驻地出发，直取长寿街，进攻平江县城；第二团自安源出发，攻取萍乡、醴陵后，向浏阳集中；第三团从铜鼓驻地出发，取道东门市，与北上的第二团会合，一齐进攻浏阳。待各路得手后，再以长沙城内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夺取长沙。

秋收起义的革命武装力量组织起来之后，在1927年9月9日爆发了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关于秋收起义的时间，有的说是9月9日，有的说是9月10日，有的说是9月11日。我认为应定在9月9日。因为第一，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说：“公达1日动身到汉，5日回长沙，立即召集了一次常委会议，各部部长均参加讨论暴动的日期问题，当日泽东从安源来一封信（安行伟有封同样的信）约定11日安源发动，18日进攻长沙。……公达在常委的提议是9日破坏铁路，10日各县暴动，13日长沙暴动。……这个提议经过约一小时的讨论，各部不赞同，遂作如下之决定：9日开始破坏铁

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此议决定之后,随即通告各地执行。”这就是说,湖南省委决定开始行动的日期是9月9日;第二,实际暴动的日期也是从9日开始的。其中虽然第二团是10日在安源发动的,第三团是11日在铜鼓发动的,但确定秋收暴动的日期应从开始行动的那一天算起。当时毛泽东亲自组织和指挥了第三团的暴动。

秋收起义的枪声,唤醒了湘东赣西广大工农大众,给了当地的反动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以上讲的是第一个阶段:秋收起义。

第二个阶段是向井冈山进军。时间是从文家市会师到进军井冈山。

秋收起义部队在湘东赣西广大地区展开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这时全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湘赣之敌数倍于我,加上余洒渡收编的第四团邱国轩部的叛变,致使秋收起义部队一、二、三团在军事上相继失利。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三团自东门市撤至上坪,当即召开了三团干部的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并以前委书记名义通知各路起义部队,迅速赶到浏阳文家市,与三团会师。

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会师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根据当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放弃继续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去的重要主张。他说,敌人的主要力量在中心城市,目前我们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要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革命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在农村,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发展

革命力量，建立农村根据地。

那么，什么地方最适合工农革命军养精蓄锐，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呢？毛泽东指着地图，生动形象地比喻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中段，适宜作我们的落脚点。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因为：第一，这里离大城市较远，是敌人鞭长莫及的地方，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同时边界的地方也是敌人容易闹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发展革命力量；第二，这里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第三，这里位于湘赣边界，我们的一举一动，能够影响到湘赣两省及两省的下游，政治意义很大；第四，这里地势险要，便于开展游击战争；第五，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总之，这个地方最利于革命力量的积聚和发展。

但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师长余洒渡的反对。余洒渡不顾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起义部队连续受挫的具体情况，顽固地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这在实质上是军事上的冒险主义。

对这一错误主张，毛泽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前委会的大多数同志也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总指挥卢德铭说，现在敌人集中力量打击我们，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再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完全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实行战略转变的意见。会议开到深夜，经过激烈的争论，否定了错误意见，通过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正确决定。

9月20日清晨，工农革命军的指战员1500多人，集合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毛泽东在卢德铭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向指战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向大家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会后，毛泽

东、卢德铭等人率领部队离开文家市，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伟大进军。

9月29日，部队到达了永新县的三湾村。当晚，在一家名叫泰和祥的杂货铺里，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当时，秋收起义部队自从文家市出发以来，一路上备尝艰辛。粮食不足，医药奇缺，天天翻山越岭，还要对付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的追击骚扰。经过江西萍乡芦溪镇时，又遭到敌军的突然袭击，损失很大，总指挥卢德铭牺牲。环境这样险恶，饥饿、疲劳、伤病一齐袭来，部队思想动荡。一部分人悲观动摇了。有些人不辞而别，当了逃兵。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们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而大多数干部、战士则是坚定的。可是他们对于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义，仍然有些认识不足，心里没有底。他们为革命的前途忧虑焦躁。前委会分析了部队的情况，决定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

第二天，部队在钟家祠前集合，宣布前委会关于部队改编的决定。师长余洒渡先走出来讲话。这个在文家市主张搞军事冒险主义去攻打长沙的人，现在却散布悲观情绪来了。他说：“现在人员减少了，部队要缩编，从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一个团还不足，改编为两个营……”他的调子越说越低沉。再看看他那“三金”、“五皮”的打扮，只见他嘴里装的是金牙齿，手上戴的是金戒指，眼镜戴的是金边眼镜，腰里束的是皮武装带，身上背的是皮挎包，腿上绑的是皮绑腿，脚上穿的皮靴子，手上还拿了一根皮鞭子，大家更是感到厌恶。

这时，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他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

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我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①。毛泽东的讲话，给指战员们以很大的鼓舞。队伍解散后，战士们一群一群地纷纷议论：“毛泽东同志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接着进行改编，改编的主要内容有三个：

第一，对部队进行了组织上的整顿。毛泽东等同志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部队减员较大的情况，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设一、三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缩编后多余的干部组成一个军官队，还有个卫生队。共有近千人。三湾改编后，部队人员虽然少了，但队伍更精干，战斗力更强了。

第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过去，军队中的党组织是把支部建在团上的。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军队中抓不住士兵的经验教训，决定把“支部建在连上”。在军队里，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以上各级有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整个部队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委统一领导，重要问题都要经过党委讨论决定。从而，使工农革命军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②

① 谭政：《三湾改编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41页。

②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4—65页。

第三，实行了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礼节，经济公开。从而破除了旧军队的习气和带兵方法，确立了我军的官兵关系是阶级兄弟的关系。

这样，从三湾改编开始，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这是按照毛泽东的建军路线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10月3日，毛泽东等同志率领部队离开了三湾，来到了宁冈县北部的古城。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

第一，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调贯彻三湾改编的精神，并决定继续整顿部队内部。

第二，着重讨论和决定了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从而使从文家市开始的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有了更加具体的目标。

第三，研究和制定了对袁文才和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方针。

井冈山，横垮江西、湖南两省，介于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地势十分险要。从东面的拿山，到西面的水口，有180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写的是“80里”，但应为“180里”，因为从拿山到水口的实际路程是180里，《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原稿《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上写的也是“百八十里”）。从南面的黄坳，到北面的茅坪，有90里。如果绕山一周，足足有550华里。山上的大小五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泥湖、罗浮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要登上井冈山，只有七条小路可走。这些小路狭窄得只能走一个人，而且在小

路的最险要处还有黄洋界、桐木岭、砵沙冲、双马石、八面山等关隘。这些天然屏障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工农革命军要进入这座雄伟的井冈山，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的问题。

袁文才，又名袁选三，学生出身。因为不甘忍受地主豪绅的压迫，拉起了队伍。1926年，在共产党推动下，袁文才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营救过共产党员，加入过共产党。他的部队驻扎在井冈山下的茅坪。王佐又名王南斗，裁缝出身，自小家境贫寒，早年便组织队伍，“劫富济贫”，专门和有钱人作对。大革命时期，王佐受革命影响，也将自己的队伍改称为农民自卫军，和遂川县农民协会有过联系。他的部队驻扎在山上的茨坪。“马日事变”后，他们凭着井冈山的有利地形，各保存了60支枪。这两支队伍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贫苦农民，是豪绅地主的死对头，因此，有着比较强烈的反抗豪绅地主的革命要求，在斗争中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远大的革命目标，队伍中封建帮会色彩和“绿林”习气比较浓厚。

对于这样两支部队，当时有人认为，他们挂的虽然是农民自卫军的牌子，实际上和土匪差不多，因而主张用武力吃掉他们。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种错误主张，指出这是大鱼吃小鱼的军阀思想，这种主张，只图眼前痛快，势必贻误革命大事。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教育下，大家统一了思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教育、改造袁文才和王佐两支部队的正确方针。

古城会议结束后，10月6日，毛泽东带了几个随行人员，骑着马，按照预先的约定，前往大苍村会见袁文才。当时，袁文才的心情极为复杂。9月底，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三湾时，袁文才正好带领农民自卫军在砵市一带活动。他们听